

陈君起:逃出南翔太史府的女革命家(3)

◆ 孙月红

王氏最后使出了一个杀手锏,她指着曾谦与曾丽两个小姑娘,恶狠狠地对陈君起说:“要走也可以,把她们也一起带走,她俩不能生活在这个家里。”这两个女儿是曾科进与家里的两个丫环生下的。曾谦是陈君起进曾家之前生的,曾丽是陈君起进曾家之后生的,比曾鼎乾小两岁。

陈君起看着你自己为妈妈的两个小姑娘,眼中充满了怜惜,她对王氏说:“曾谦与曾丽的妈妈都是你的丫环,按理说,她们应该生活在这个家里,由你们抚养。当然,如果你不愿意抚养,我也可以把她们一起带走。”

又是一个严寒的冬天,又是一场大雪过后,陈君起抱着出生仅仅几个月的曾丽,牵着儿子曾鼎乾,后面跟着曾谦,离开了这个家。

曾科进不愿意搬出大家庭,两人就此分居,他们虽然没有正式离婚,但夫妻已是徒有其名了。4年后,曾科进受不了继母王氏的逼迫也离家出走,前往北京定居。

教书又织巾 抚养三子女

陈君起去了一所小学教书。她让曾鼎乾与曾丽待在家里。

一家四口,靠陈君起的薪水,紧紧巴巴的将就着过日子。陈君起虽是个富家女,但她却很会过日子,在这么艰苦的日子里,她想尽办法攒下一些钱,以备不时之需。

陈君起靠教书与以前工作积蓄下来的钱维持生活。随着孩子的长大,家庭开支越来越大,渐渐地积蓄也用光了。陈君起一家陷入了困境。为了维持全家最简朴的生活,陈君起开始白天教书,夜晚替人织毛巾,昼夜操劳,没过多久,病倒了。

此刻儿女们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,陈君起心急如焚,四处奔走,跟亲友们借钱,让孩子们能够上学。

陈君起虽然只有曾鼎乾这么一个儿子,但她从不娇惯他。不仅在功课上要求严格,在做人上更加严厉,不准说假话,不准说下流话,不准瞎传话,不准有不好的生活习气,不准与调皮捣蛋的孩子在一起干坏事,当日事当日毕等等。

曾鼎乾后来回忆说:当年在每日晚饭后,一盏煤油灯下,母亲陪着我们一起三个人读书、做功课。我家常年订有一份《申报》,家里再困难,母亲也要订的。我们做功课,她看报纸,这是她多年的习惯。我们功课做完后,母亲就把报上的新闻讲给我们听,特别讲那些爱国新闻,久而久之,我幼小的心灵里就有了一些爱国思想。五四新文化运动,喊出了陈君起的心声,她参加了南京请愿队伍。

阅读《新青年》 加入共产党

“五四”运动期间,陈君起结识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谢远定、宛希俨等学生。谢远定、宛希俨是湖北籍学生,他们在武昌读书时,就在恽代英等人的影响下参加了当地的五四运动及进步社团,并阅读了有关社会主义、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。二人来南京后,同恽代英等人继续保持着密切联系。1921年5月,谢远定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。一天,谢远定将《新青年》等刊物带给了陈君起,陈君起如获至宝,把刊物带回了家。《新青年》中的内容吸引了她,她一口气读完了所有文章,之后,又读了由陈独秀、李大钊创办的政治周刊《每周评论》等进步刊物。



陈君起在南京小学当教师时的留影

之后,在谢远定的影响下,陈君起又开始研读马列主义理论,并于1923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。此时的陈君起已是一位38岁的知识女性。她深信,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,并愿意为之奉献自己的一生,甚至生命。

1923年,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为贯彻党的“三大”制定的国共合作的方针,建立了以沈雁冰为委员长的国民运动委员会,并决定:“限最短期间内全体加入国民党。”

1923年年底以前,南京全体共产党员、青年团员都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。就在这一年,陈君起也加入了中国国民党。

1923年底,在中共南京地委的支持下,陈君起着手筹建南京妇女问题研究会。1924年5月,在北极阁正式成立了南京妇女问题研究会,会员30人,陈君起任该会负责人。她与同志们一起调查研究中国妇女受压迫的原因,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妇女运动的情况以及今后妇女运动的方向等,向

广大妇女宣传反帝反封建的主张,发动妇女们踊跃参加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。研究会的会刊为《妇女旬刊》,陈君起的家成为活动场所。

1924年初的一天,陈君起从外面回家,笑容满面。儿子鼎乾觉得妈妈今天特别漂亮,就问妈妈为什么这样高兴。陈君起耳语般地告诉儿子鼎乾:“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”

曾鼎乾先生后来回忆说:母亲自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我们家就成了南京党组织的一个活动中心和秘密机关,恽代英、萧楚女、林育南等人到南京时就来我们家开会。母亲开始向我讲述党内的纪律,明确告诉我这个“家”的任务,要我看好“家”。地委在我家开会时,母亲就叫我在外屋一面玩,一面放哨。再后来,母亲就让我给他们送信,送通知,跟他们出去玩。”

陈君起的家是南京居安里20号,是前些年为了方便儿子读小学,向一个宋姓房东租的。居安里20号,独门独院,离当时的东南大学、金陵大学等校区很近,而且偏僻隐蔽,附近都是菜园、鱼塘。陈君起曾对儿子说:“为了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,你一定要保守秘密,即使个人牺牲了,也要保护组织与同志。”母亲还对他约法三章:一,家里来往人员、活动,不许对外说出一个字;二,大人在屋里开会时,你要在院子里看书写字或者自己玩,要注意周围的动静,有陌生人来时喊一声,不能让陌生人闯进来;三,同志们有什么事情要你去办,比如送信等等,你要去送,信件不能给任何人看,送完后立即回来。

为了培养儿子对党的忠诚,她带回来一本苏联小说给儿子看,小说讲述了革命党人舍身炸死镇压革

命的刽子手的故事。看完小说后,儿子鼎乾的眼睛已经被泪水模糊了,他懂得了母亲的良苦用心。

上海“五卅”惨案的消息传到南京,青年学生群情沸腾,南京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,决定广泛发动群众,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。6月1日下午,东南大学附中学生率先罢课。2日,东南大学全体罢课,同时成立了“五卅”运动东南大学后援会。南京党、团组织又发动英商和记洋行工人罢工,以抗议英帝暴行,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。6月3日上午,陈君起出席了东南大学、志成中学、妇女问题研究会等48个团体发起在公共体育场召开的全市声援“五卅”运动大会。4日,南京各界3万余人举行了联合大游行,陈君起参加了演讲,并散发、张贴“打倒帝国主义”“收回租界”“严办五卅惨案凶手”等传单。

为救济和记工厂罢工工人,陈君起参加了募捐工作,筹备印制募捐簿,管理募捐账目,亲自向女工发放救济费等。她工作细致,一丝不苟,忙得废寝忘食。她还对因参加“五卅”运动遭到开除的一批女中学生进行了慰问,促成她们转学。1925年秋,陈君起当选为共青团南京地委妇女委员兼第三支部书记。

1926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一周年,国民党中央于这天的下午3时,在南京中山陵墓地茅山坡举行孙中山先生陵墓奠基典礼。南京的中共党员基本上都去了。在奠基礼上,国民党右派与陈君起们发生了冲突,绍裘受了重伤。打手向柳亚子先生袭击时,陈君起与张应春等人在受伤的情况下,护卫柳亚子迅速下山。陈君起意识到国共关系的严寒将要到来。

一生一首翰墨诗 ——周慧珺传

李静 张亚圣



到了夏天,哥哥姐姐们会带上她一起去游泳。但因为年纪和哥哥姐姐实在相差太多,年岁最相近的周世珺也长她五岁,因而小慧珺大多数时候还是落单。这种印象是深刻的,很长时间都无法摆脱这种挫折感、孤独感,造就了她顽皮但不合群的性格。如小慧珺五岁时,周志醒把她送进了附近的一所小学堂。第一天进课堂,刚坐下看着一室陌生人,小慧珺就哇哇大哭,逃回了家。翌日,又哭着喊着把着门框不肯去学堂,家人也没了法子,上学的课只得作罢。

上学的事虽一再拖沓,但读书识字的事却不能耽搁。那时她的父亲钟情于收藏,堂屋里挂满了书画,收藏的字画不下数百。还特将一间居室辟为藏画室,取自己名中一字,号为“齋舍”。家庭的翰墨氛围使她受到了良好的熏陶启蒙,早在周慧珺学龄前,即“董蒙养正”。周母教授她识字,也读唐诗、《三字经》。五岁时,父亲还要求他的孩子们每天要花一定的时间写毛笔字,完成日课。

位于上海六合路上的宁波同乡会第十小学创办于1927年,至1947年周慧珺入读该校为止,已是一所颇具规模的完全小学。当时以宁波路六合路为辐射带,周边居住的大多为宁波人,所以该校学子甚至教师也多宁波人氏。这里就能看出父母的拳拳之心:希望内心羞怯、不善合群的周慧珺能在浓浓乡音乡音中融入集体。开学第一天,周志醒亲自送她去学校,鼓励她开始自己的学子生涯。

对周慧珺而言初入学校仍不免感觉陌生、拘谨,好在那班主任是宁波人氏,说话带着浓厚的宁波口音,言辞又和善,使她听来十分亲切。学校地处闹市,面积小,活动空间不够,反倒使同学间能有更多时间近距离地交流。孩子的天性是活泼好动的,没多久小慧珺就喜欢上了学校,结交起小伙伴来。由于她在家接受的课程比学校教得深入,所以学校的功课对她来说不怎么费力,每逢考试也总能拿第一名。

读完三年级,大哥周坚白打听到宁波路第三小学的英语开课较早且教学突出,希望妹妹能尽早开始学英语。当时,一口流利的英语是职业妇女、名媛闺秀的必备素质。于是,周慧珺在大哥的做主下转学去了宁波路第三小学就读。

25. 呕血半升

先生似乎仍难以遏制议论朝政的冲动。道光十七年(1837)三月,先生由宗人府主事改任礼部主事,在第二年正月,他又上书堂上官,论四司政体宜沿革革三千言。又是一份长篇意见书。以先生个性,胸臆间有言而硬憋住,那颗跳动的心脏是要喷出血来的。且看看,他这篇《在礼曹日与堂上官论事书》提出的四大问题的要点:一、则例宜急修也。二、风气宜力挽也。三、祠祭司宜分股办也。四、主客司宜亟加整顿也。

根据后来龚自珍生存状况可以断言,龚自珍到了哪个部门都要提意见,其后果必然恶化了他本人的生存环境,激化了他与上司、同事之间的矛盾,一步步把自己逼到了墙角。

先生还有一份改革朝政积弊的手书建议,但未能留传下来。道光十二年(1832),天气反常,很多省份久旱不雨,如此大面积的旱灾,必然带来农田的普遍歉收,政府的税赋难以征收,而且会让大量农耕人员陷入饥馑。按照传统的天人感应的哲学理念,天灾总是与人事相联。天公发怒了,圣上不能不反思王朝在什么地方触犯了天公。六月,“为弭灾起见”,道光帝諭令在京各衙门例准奏事人员,“摅诚直言,各抒所见”。就在此背景下,已至耄耋之年的东阁大学士富俊素闻自珍才识,竟然五度到龚自珍处访问。龚自珍为老先生诚心所感,乃手书《当世急务八条》呈示。公读至“汰冗滥”一条,面露难色,知道此弊虽严重,但难以革除。龚自珍当即将此手书点燃,付之一炬。那无情的火苗,也将两颗试图革除政弊的心,一点一点化为灰烬。

有感于富俊心之诚——如此高龄,职位又比自己高,能如此不耻下问,实属不易,龚自珍感动不已。在《己亥杂诗》第七十七首中对此有记载:“厚重虚怀见古风,车裉五度照门东。我焚文字公焚疏,补纪交情为纪公。”

也因此,《当世急务八条》一文在富俊阅过即化为轻烟,未能存世。今人只能从龚自珍的诗和诗后自注中,知道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。《清史稿》如此记载龚自珍的行止:“所至

必惊众,名声藉藉,顾仕宦不达。”因行止与众不同而为世俗难容,并成为他“仕途不达”的致命根源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场和社会呢?

久沉下僚,言路堵塞,处处碰壁,壮志难酬,龚自珍心情之郁闷,导致健康严重受损,终于在道光十六年(1836)春某日,一腔热血从口中喷射而出……

郭延礼《龚自珍年谱》载:“今春以来,先生因思归郁勃,事不顺心,积痾所鼓,肺气横溢,遂致呕血半升……”

是年,龚自珍四十五岁,正当盛年。

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,给不同境况的世人提供了不同的人生路径选择。“入”则儒,所谓立德、立功、立言,所谓修身、齐家、治国,乃至为帝王师;“出”则释,在禅境诗意的空灵中,规避俗界的苦难;还有一种选择在“出”和“入”之间,不是不为,而是顺势而为,如涓涓流淌的溪流,遇礁石则缘石而行,绝无辟石开道的野心,但有滴水穿石的坚韧。此类人,通常相忘于江湖,隐于山野丛林间,他们也食人间烟火,但绝不俗情所困。“出”或“入”则完全视天下大势及个人境遇而做选择,对于个体生命质量的考量,超越了对于社会道义的责任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?世间极少有之智者也。

既然,传统文化已经为各类不同生命个体提供了多元的选择,为何人世间还有那么多的苦难和烦恼。这是因为,具体到每一个不同的个体,他对人生哲学的理解和追求,有着非常复杂的因素。很难在非此即彼间,做出泾渭分明的划分。

有人说,龚自珍是中国最后一位传统士大夫型的人物,他虽然很伟大,但他的人生追求,仍然未能脱离传统士大夫的思维窠臼。脱离龚自珍所处的历史环境,要求其拔着头发离开地面,成为现代性的知识分子,大概过于苛求这位先贤了吧?龚自珍的先知先觉,贯穿其一生的强烈的批判精神,已经足以使之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矗立的丰碑。有人在梳理中国文脉时,轻描淡写地忽略龚自珍的精神文化贡献,只能说他对龚自珍知之甚少。

剑魂箫韵

陈敬耕



龚自珍